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演化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农

▶▶▶[上接03版]

但凡健全的组织,都具有满负荷运行的意愿或倾向。尤其对于在产出上力图赶超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共而言,更为如此。因此,"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认为做不到,这是党的最高决策者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当信息不完备时,完全划清满负荷与超负荷之间的界限,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这样,当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物资紧张、运力不足、通货膨胀等"过热"征象,为此需要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时,则恐于积极性的挫伤而得以一定程度的延误。更为重要的是,所采取的"反反冒进"在结果上,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而"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的风气。

在满负荷运行的意愿下,中共原本确定的产出目标已经显得够高。1957年11月,毛泽东亲率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其间的经历为日后产出目标的不断加码提供了契机。由于中共代表团所展现的平等意识以及在《莫期科宣言》的认同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中国在东方阵营中赢得了较高的赞誉,毛泽东本人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与意共和英共领导人的交谈,加深了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而莫斯科红场上滚滚驶过的钢铁洪流,又使他惊羡不已。为了尽早摆脱由于经济落后所造成的中共及他本人在东方阵营中的"压力"和"束缚",要使15年至少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超过英国,似乎既是他的使命所在,又是他所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至于最后将赶超的期限缩短至两年,并进而掀起"大跃进",他是难逃其咎的。

经过反右和整风(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运动,中共最高决策层因而相信: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较量中,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中,"东风"已经完全压倒了"西风";全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统一;党与广大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样,对于组织内部和谐程度与控制能力的乐观判断,跟产出目标的过高确定相结合,促使中共最高决策层在积极性与控制力的权衡中极大地偏向了积极性的一端。于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从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成为动员全民族一切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的精神武器。

除宣传鼓动外,调动一个组织内部不同层级积极性的实质有效的方式是向下级分权。对此,中共有着更深的考虑。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如何避免教条主义式的照抄照搬,始终是其试图求解的一个课题。当时已经认识到:以"条条"为主的苏联模式,在维护中央一级积极性与控制力的同时,显然由于统得过死而挫伤了地方的积极性。因此,向地方与企业分权,从而形成以"块块"为主的分级管理体制,就成为力图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一种尝试。如果说"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主要建立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和中央一级工业化的基础上,那么"二五"时期则加大了通过省、县地方的工业化而加以推进的份量。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确立的"三个并举"(即: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正是这个意图的体现。这样,按照在成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财政、工业和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的要求,大批企业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的财权得到明显的扩大(包括预算外资金、财政结余的使用、地方机动数的安排、收支包干等),企业的权利也得到相应的增强。

然而,以"块块"为主的分级管理体制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最高决策层的预料。首先,由于国有制企业的真实归属取决于各个主体对于利税的分割、以及生产建设过程中对投入品的控制,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加热衷于铺大基本建设的"摊子",以便在地方之间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这样,体现中央与地方和谐的"并举"目标,由于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其次,中央对于地方和企业的控制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中央有关部委(如计委、经委和财政部等)职能的正当履行上。由于在1953年的"修正税制"和1957年"反冒进"而遭受批评,在地方和企业的要求下,这些部委原先制订的许多规章制度得以废弃,有些重要的立法权限(如税收管理中的相关条款的制订),也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名义下由中央移至地方。所以,财权与立法权的扩大意味着地方"联邦化"倾向的出现。再次,企业在超额利润分成的诱导下,进一步增强了扩大生产规模的意愿,尤其在重要规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甚至不惜挪用流动资金并以预算外基本建设的形式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最后,一个庞大组织所须支付的信息成本是难以估量的。由于行为主体之间目标的

差异,在统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反映产量、效益等信息发生扭曲。毛泽东抱怨:对于国内真实情况的了解,甚至不如对国外更加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从"放"又回到"统",以及"统"所产生的"僵死"的弊端,本身就是单一公有制下的计划体制所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信息成本。

上述问题——集中表现为"失控",通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进一步放大,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撇开随机性或突发性事件的影响,造成经济发展运行层面失误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农业状况的乐观估计。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先由中央提出基本控制数,然后将其分解到地方;地方根据具体情况作相应调整后上报中央,中央在此基础上再作决定。在"浮夸风"的推动下,1959年公布的计划粮食产量竟达5亿吨,约为当年实际产量的三倍。在这样的控制数基础上的国民经济计划,作为实际运行的导航图,显然会使国家这艘大船"触礁"的。其实,自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中国的农业境况并不乐观,这从主要农产品的征购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仓储的变动中得以窥见。如果我们将农业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在理论上作一简要分析,其中的道理便不难明了。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它的"细胞"(生产队)可以视为在生产管理上接受上级指令的高级社。从分配上看,社员根据身体条件和劳动表现得到工分,而单位工分的价值则取决于全队的总产出。所以,在理论上,生产队就是霍姆斯特朗(Holmstrom,1982)所刻画的一个合伙制团队:每个队员的所得来自他在团队总产出中的分成,而总产出又取决于所有队员的付出。在这种分配规则下,队员劳动付出的最优选择(纳什均衡)应当满足"边际负效用等于他所能分到的那部分边际产出",而不是导致全队帕累托最优的"边际负效用等于全队的边际产出"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队员的劳动供给是不足的。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式予以表述:如果一个队员多干活,就让其他队员分享了他劳动付出的成果,而他偷懒,也使其他队员为此承担后果,在这种"外部性"相互施加的情况下,全队的总产出不足以达到"合意"的水平。这是高级社与人民公社低效率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考虑分配中的"人七劳三"比例、队员没有自由退出权、生产队经营决策权不完整、社队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公社内部不适当的再分配、公社之外的平调、以及农产品征购比例过高等因素,那么效率将更加降低。由此,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一方针的转变,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要素形成"阶段这一发展路径的选择存在明显的错误,这是必定无疑的。但并不是说,这种选择就无所作为。(例如,按照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至1978年我国国有资本总额由147亿元增加至3546亿元,增长了24.1倍。)公有制下的公共决策体系,在消费和积累的比例中,试图最大限度地满足积累的要求,并将形成的生产要素投入到所需的工业部门,这种动员能力在中国克服发展性短缺的过程中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尤其在"要素形成"阶段的初期,这种作用显得尤为突出。首先,尽管生产要素普遍匮乏,但由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工业原料的供给是相对充裕的,与此同时,又存在着对产出品的强烈需求,这就为产品交换率较高的保证下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乃至过度利用创造了条件。其次,在要素形成阶段初期,由于工业门类不全、基础设施薄弱,投资领域和项目的选择存在较大的空间;换言之,投资于许多领域或项目,对于国家需要而言都是等价的,因而投资效率是较高的。最后,与传统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功利主义相似的是,中共提倡的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与儒学思想相融合,也有效地支持了国家资本的形成。

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形成,发展性短缺的程度越来越小,计划体制的弊端便日益显现出来。这种弊端集中体现在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与激励缺失两个方面。而以上两个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由(产品与要素的)价格信号扭曲所导致的。当发展性短缺减弱时,生产能力的过度利用,往往会造成产品交换率的下降,从而导致产品的积压。此外,随着发展性短缺的不断降低,投资方向选择的价值就会相应上升;在缺乏规范信号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投资"势必造成盲目投资,进而导致投资效率的降低。以上两点,加上计划体制固有的预算软约束的特性(科尔内,1986),就会产生以体制性短缺与滞存并存为表现的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而且,与总量增长相随,这种结构失衡也会呈现周期性的变动:在给定的周期内,随着时间的变化,结构失衡的程度是不断增加的,以至于在宏观经济的调整期,计划当局在压低总量增长的同时,往往要以"关、停、并、转、迁"等手段,强行矫正失衡了的经济结构;这样的情形又将随着下一周期的运行而往复出现。假如对于经济结构的矫正未能达到周期起点的程度,就会产生结构失衡的积累效应:经济周期将不断缩短,调整日益频繁,国民经济将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赵农,1996)。与此同时,要素价格的长期扭曲,以及员工对于企业与岗位选择权利的被剥夺,则势必造成员工激励的下降,因为长久而普遍地依赖于道德自觉,显然从根本上违背了利益原则,它注定是难以为继的。

总之,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形成,在缺乏要素优化配置的情况下,它的边际效率就会发生递减,此时,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大工厂",就会因规模相对过大而处于规模不经济的处境。换言之,要素形成对于总产出(尤其是社会净福利)的决定性地位动摇了,而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依赖于要素的优化配置。当单位成本用于要素优配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普遍超过要素形成时,中国就将迎来改革开放的时代,经济发展也就进入以要素优化配置为特征的新的阶段。

四、从要素形成阶段转向要素优配阶段: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

要素优化配置的问题,早在"三大改造"完成之际,就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针对因商业部门的包销造成的产品质量下降、供销合作社的独家经营所致工业原料供给的减少、以及竞争削弱带来的成本的上升等问题,陈云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设想,试图在计划体制的基本架构下,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个体经营和可控的"自由市场",以期改善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不过,这一设想,尤其当中国刚刚跨入"社会主义"之时,多少显得不太协调。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似乎很难容许"资本主义的尾巴"得以存留。这样,在纯粹的计划体制下,只能设想以地区及企业之间的"协作"来替代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竞争。"大跃进"之后,为了摆脱饥馑,公社体制内部采取了包工到组,甚至有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自由市场也较为活跃。然而,一旦情况好转,这些"无时不在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便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俎之下的"鱼肉"了。

时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经过调整虽然恢复了常态,但计划体制及其要素形成的作用则日渐式微,这从"古董复制"(外延的扩大再生产)、重工业的内部循环、以及城市失业增加(与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可见一斑。另外,又从市场力量中领略到要素优化配置的功效。此时,中国经济仿佛行进至重要的关口。显然,中国实际上并未因袭苏东组建大型托拉斯企业并以此在计划框架内改善资源配置的方式,而是试图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以对人的改造和作为超常的激励机制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确,对于最高决策者而言,若要原有体制的"始作俑者"亲手转舵,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在那种政治权威体系下,这无疑等同于"自毁长城"。从现代博弈论的角度看,一场旨在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攸关控制权归属的"文化大革命"(两者确实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对他来说,无论在均衡路径抑或非均衡路径上都是占优策略,即一个精炼的纳什均衡。而十年动乱,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将个人的"收支账户"外部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的集中的公共决策的性质所决定的。

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以分散的私人决策为前提的。具体说来,它要求:(1)有众多独立的经济主体,在一定的法律约束下可以自由选择行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体系;(3)公正的法治环境。以上条件的满足,势必要求进行体制改革。到了20世纪70年代,改革的时机日臻成熟。首先,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事实上将中国抛出"东方阵营"之外,国际意识形态的制约则化为乌有,中国已将战略方向由"东西对抗"调整为"南北对峙"。其次,中国和美、日等国改善了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与西方世界封冻长达20年之久的"坚冰",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后,十年动乱促使将来的中央第二代核心成员深刻反思,以至于突破计划架构的藩篱俨然成为未来蓝图的"底色"。

任何改革者,不得不考虑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中国体制改革的成本主要包括:(1)意识形态的转变所需付出的努力;(2)利益格局的调整所产生的阻力;(3)利益补偿所要支付的代价。改革的收益则是因要素的优化配置而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党内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为改革的前奏曲,有效地降低了意识形态成本;而"伤痕文学"及艺术的兴起,也使民智在新时代即将来临之际得以开启。十分幸运,党内高层的主流意识站在了民众和时代的前列。

中国体制改革发端于农村,这不应该感到奇怪。若将安徽小岗村当作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发明地,则无疑是"失之千里"了。其实,在计划体制下,"包产到户"早就有所试行。尤其在"低标准"的岁月里,"包产到户"还一度较为盛行。"包产到户"所显现的较高的相对效率,无疑对公社体制以及整个计划经济构成重大威胁。因此,除开极其特殊的时期,它一直受到来自计划当局的强力抑制。可以说,中共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发源于农村合伙制团队低效率的困扰以及对于诸如"包产到户"等自发的制度安排的妒意与敌视。这样,强行构造的所谓农村集体经济,居然成为中国"运动"频繁和"斗争"高悬的一种路径依赖。然而,当中国城市职工的实际收入在1958到1978年间平均以0.1%的速率发生递减(中国农要发展问题研究组,1987),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尚须票证供应,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存在温饱问题,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理念,不仅显得苍白和荒唐,而且已经招致"天怒人怨"了。所以,一旦意识形态的羁绊被扫除,哪怕政府只是一种默许,家庭联产承包制(昔日的包产到户)便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公社体制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

五、结论性评论

本文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审视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变。史论相结合,揭示了通过公有化而形成的计划经济人为地将要素形成与要素优配割裂开来,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经济发展阶段。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发展路径是必须选择的,只是中国确实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径。其实,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早已成为决策层的奋斗目标时,此后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局势不过充当了这一历史大剧的舞台和背景。至于这种意识形态究竟如何造就的,除了传播学上的考虑,恐怕还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当然,这是另文所要研究的主题了。

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大量的生产要素,而且这与中国日后的经济起飞不无关系,我们仍然不应该为此欢呼称道。理由在于,这种发展路径的社会成本实在过高。由于缺乏要素优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和资源大量浪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抵了计划体制动员能力的实际功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运行须以违反人道的措施(如歧视、强制、批斗等)作为保证,就更无理由认定这种选择的正当性了。当然,国家主体论者不会赞同这样的看法。

本文没有对要素创新阶段展开讨论,并非完全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而是该阶段的到来需要更加严苛的体制要求。唯有在公正的竞争秩序下,才能实现自由创造的梦想。这还有待国人的进取和努力。

(完)

热视角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两名最亲密盟友警告他说,他们将反对英国限制欧洲劳动者迁徙自由的任何企图,这进一步打击了英国首相限制移民的计划。

卡梅伦限制欧盟移民计划遭反对

卡梅伦近日飞往赫尔辛基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开展磋商。他面临着芬兰东道主的警告:劳动者迁徙自由是一条"神圣"原则,而对欧盟(EU)条约进行重大改革的支持"十分微弱"。芬兰亲英国的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表示,他想帮助卡梅伦,但是在重启欧盟谈判的问题上,即使是最亲密的盟友也不能越过某些底线。

瑞典新任中左首相斯蒂凡·洛芬(Stefan Lefven)也批评了卡梅伦限制迁徙自由的呼吁。目前有人提出,英国首相正考虑建立一套配额制度。

洛芬表示:"如果我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市场,然后有一、两个国家表示我们想要改变这一安排,那就不成其为内部市场。我们可能有其他需要改革的地方。"

此前曾有报道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宁愿让英国脱离欧盟,也不愿改变迁徙自由的规则。欧盟委员会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我和戴维·卡梅伦之间没有问题。他是和其他成员国的总理之间存在问题。"

卡梅伦在英国下议院坚称,他已有计划:"我们希望建立针对单一市场的防护机制,我们希望不加入越来越紧密的欧盟,我们希望进行移民改革。"他将与一些自由派欧洲领导人一起出席两天的北方未来论坛会议,就自由贸易、放松监管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磋商。然而,斯图布表示:"我们需要理解英国的诉求,而英国则需要知道其他成员国的底线在哪里。"他用了"神圣"一词形容欧盟有关商品、资金、服务和人员自由迁徙的原则。

他说:"至于是否会达成某种安排,我不知道。不过,要想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自由迁徙加以限制,我认为是很难做到的。"斯图布表示,欧盟领导人也许能通过合法的退出安排,接纳卡梅伦部分其他要求,不过他支持默克尔反对对欧盟条约进行重大改革的立场。 (FT中文网)

财经新闻

汇丰中国服务业PMI降至4个月最低

汇丰银行(HSBC)最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今年10月,由于成本上升,中国服务业增速降至4个月低点。

汇丰10月中国服务业PMI报52.9,低于9月的53.5,为自7月以来最低。

尽管读数超过50表明服务业仍在扩张,但它增速放缓,加大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压力,他们正试图借助强大的财政或货币刺激支撑经济增长。

该指数基于对400家私营企业的调查,与中国政府所做的非制造业调查相符。本月初公布的官方指数触及9个月低点。官方调查的覆盖范围更广,跟踪的企业规模也较大。

汇丰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投入价格继续上涨,但产出价格略有下跌。"总体来说,今年10月,中国服务业稳步增长,商业环境继续好于制造业。这种模式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政府将出台进一步的宽松政策,以帮助抵消经济下行压力。"

(FT中文网)

地址:四川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121号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北京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3号5号楼 电话:(010)87721045 52896956 52896958 87527365(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5100004000280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